



建国之惑

任剑涛◎著

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

JIANGUO ZHI HUO
LIUXUE JINGYING
YU XIANDAI ZHENGZHI DE WUJIE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建国之惑

任剑涛◎著

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



JIANGUO ZHI HUO
LIUXUE JINGYING
YU XIANDAI ZHENGZHI DE WUJIE

D663.5
R48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 / 任剑涛著.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4

ISBN 978-7-5620-4229-7

I. 建… II. 任… III. 知识分子-思想评论-中国-现代 IV. D. 66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554号

- 书 名 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zhengfadch@126.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586(编辑室)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720mm×960mm 16 开本 18.5 印张 250 千字
- 版 本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229-7/D·4189
- 印 数 0 001-3 000
- 定 价 36.00 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印刷厂负责退换。

C 目录

CONTENTS

导论 中国留学运动的两个面相与现代政治的正见与误解 /1

- 一、留学运动的两个面相 /2
- 二、学术与政治的纠缠：现代政治的正见与误解 /10
- 三、接受与超越的胶着：现代政治的知识与实践 /20
- 四、在建国的功利思维中 /33

第一章 思想的钝化：中国现代政治理念的英国导向 /46

- 一、现代典范的思想钝化：英国为何偏爱第三条道路 /47
- 二、从严复、储安平到“吉登斯热” /57
- 三、英国是否堪为中国范？ /70
- 四、清晰的政治思想与合理的政治转轨 /78

第二章 饮鸩止渴？——汉语政治学界的德国魅惑 /85

- 一、无处不在的德国：中国之“德国”的预演 /86
- 二、为救世谋划：作为镜鉴的四种德国政治理论 /92
- 三、玄思魅力与权力推手：在德国魅惑里的中国 /100
- 四、回归中国：确立政治学的经验品格 /111

第三章 激情的感染：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法国酵素 /118

- 一、来自法国的刺激 /118
- 二、法国政治思想的张力与中国留学生的认取 /128

三、在革命中汇流 /139

四、精神不死?! /151

第四章 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 /157

一、在成熟现代国家中迷失的建国秘诀寻求者 /158

二、两个典型例证 /168

三、在民主与专制之间 /182

四、错位的抉择：美国大学状况与中国政治现实 /193

第五章 革命的感召：“以俄为师”与中国的革命建国 /201

一、面对建国压力：“精神留学”俄国的产儿 /201

二、在留苏的国际筹划中：异国留学与在地留学的
双重机制 /210

三、列宁—斯大林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建国 /221

四、学生、对手与惺惺相惜 /233

第六章 接引现代政治的桥梁：留日学生对现代政治理念的承接 /242

一、“同文同种”、近邻典范与留学大潮 /242

二、两代人物：晚清激进学生与民国两栖领袖 /252

三、国家的激进化与留日学生的革命取向 /265

四、留日的转向：从“东土寻宝”到“西天取经” /274

后 记 /286

导论



中国留学运动的两个面相与 现代政治的正见与误解

晚清兴起、民国兴盛并延续至今的留学热，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面相。这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定见。但是，审视近代以来的中国留学史，人们不得不承认，这部历史是以复杂的面相崭露给世人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留学运动，一方面对于中国的现代转变发挥了极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对其积极意义给予无论怎么高的评价，都是有充分依据的；另一方面，留学运动对于中国现代发展发挥的消极作用，尚未被人们直接指认，并加以深入研究，从而促使人们警惕留学运动的负面效应；再一方面，从中显示中国留学运动健康发展的路向。

从中国现代建国的特定视角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运动，也可以做出相应的确认：一方面，留学生对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的输入，宪政民主法治制度安排的介绍，以及社会政治动员方式的尝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建国进程；另一方面，留学生——尤其是处在中国建国关键时刻，即必须确立国家理念、基本制度和政治秩序当口的留学生，对现代政治的误读，导致中国人对现代政治的误解，以致误导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从留学运动的两面审视现代政治引介的两面，就成为紧密关联起来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留学运动的两个面相

中国留学运动自晚清始。晚清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有过零星的留学活动。在佛教传入中国并兴盛起来的时候，中印文化的紧密联系，就部分地通过留学生的活动而得以实现。中国习佛者到印度留学，即人们熟悉的“到西天取经”，成为中国古人第一次较具影响的留学活动。^{〔1〕}但是，这样的留学活动，毕竟是以零散的个人活动为主。而且它对整个中国的发展状态，没有发生规模化的影响。

晚清真正掀起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大幕。这与中国的国家处境出现的重大逆转，具有密切关系。恰如论者所说：

“留学之成为政策，始于前清拳民之乱的重创。当时留学何以成为政策，不可不略溯中西交通的历史。中国素以闭关自守立国，本国而外不知其他。所以自尊为华夏，称他国为蛮夷。自鸦片战争而后，国人始知外国人亦有坚甲利兵足以制我死命，乃于同治、光绪之交，派遣学生赴西洋学习算学、驾驶等事，于是观念一变。然而还只视为偶然的事情，所以留学生中途撤回，当然说不到留学政策。后因不履行条约而召英法联军入京之辱。不久又经中日之战而失败，经拳民之乱而召八国联军入京以至皇帝蒙尘，于是始知自己的能力不独不及欧美，并且不及日本。但日本在数十年前其国势固与中国等，推原其区区三岛而能战胜我国之故，不得不归功于变法。故改行新政为当时图强的惟一急务。所以戊戌变政不百日而败，竟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自动由所谓皇帝、皇太后下诏飭各大臣议复新政，二十七年三月三日再颁上谕设立政务处，请庆亲王、李鸿

〔1〕 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留学印度的佛教高僧玄奘，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19~320页。

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催促大家奏陈新政的办法。当时复奏者多以奖励游学为言。”〔1〕

论者据此得出结论，“前清的游学政策，是以外侮的压迫与图强的要求所构成的，其目的在用简捷的方法造成安邦定国的人才”。〔2〕

在此，论者给人们两个重要的提示：一是留学运动是由双重动力推进的，一重动力是晚清中国抵御外侮的需要，另一重动力则是中国自身奋发图强的必须。二是留学运动具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用简捷的方法”，另一个特征是“造成安邦定国的人才”。可见，晚清政府极力推动的留学运动，乃是内外压力促成的教育运动，而且其紧迫感之强，不容稍缓。但是，从留学史的角度看，晚清留学的肇始，并不是派遣留学生去西方系统学习其科学技术、人文法政。晚清政府最早派去西方国家的人士，也不是学生群体。为了推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学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晚清首先派出海外的人员，乃是两批人士：一是达官贵人，他们被派遣到西方国家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他们观察西方先于中国发展的现状，从而形成改变国家的理念，推动国家的现代转变。因此一般将之称为“游历”，而不叫做“留学”。二是“讲求实学专科，以期实用”、修习“专门艺学”的人士，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国技术领域的落后状况。〔3〕留学运动的真正兴起，是在中国与美欧数国达成庚子赔款多余款项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的协议之后。近代留学运动的演进，因之被论者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致力培养新型技术人才的洋务运动时期；二是全心吸取现代社会科学成果的戊戌变法时期；三是清末民初留学多元化时期；四是五四前后寻求救国方案的留学时期。〔4〕

〔1〕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小史”，载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46页。

〔2〕 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页。

〔3〕 参见陈学恂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及以下。

〔4〕 参见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五四以后，中国留学运动的国家主导成分下降，尤其是在 20 世 20 年代以后，除开留学苏俄，更是逐渐进入一个留学生自主选择留学国家和学习专业的状态。1949 年政权易手之后，留学一面倒地朝向苏联、东欧。直到 1980 年代，基于国家重建需求人才的形势需要，留学欧美的闸门才重新打开。总体而言，中国留学运动的这六个阶段，都是在国家命运与个人发展的双重导因下，凸显其阶段特征的社会变迁过程。在本书论题的范围内，晚清、五四前后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的留学运动，是最切近论旨的三个阶段。但全书论述以前两个阶段为主。

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运动与中国的现代转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教育 - 社会事件。因此，评价中国留学运动，无疑也就只能在中国现代转变的大背景下，才能找准坐标。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史，其对中国现代转变发挥的积极影响，自不待言。这是中国留学运动最为人关注的积极面相。犹如论及中国留学史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国留学运动对于中国的现代转变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起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留学运动促使中国人形成了现代世界的真实视境。那就是推动中国人告别了古典的“天下”观，而逐渐形成了现代的“世界”观。在留学运动兴起之前，中国人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晚清著名思想家魏源已经编制了《海国图志》，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标志性著作。但是，魏源还只是通过第二手资料编订这部著作的。直到留学运动兴起，中国人方才真正规模化地走向“世界”，从而彻底告别封闭自恋的“天下”理念。这一历程，经过了引人瞩目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留学运动声势未起，仅由晚清政府派出的海外游历、游学者，开创的初识世界的崭新理念。此如奕訢在“奏请派员随赫德往泰西游历折”中所说，派出人员的理由是：

“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

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

而派出人员的使命是，“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 这一阶段以游历的形式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奠定了此后留学生甄别所到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事项的基础。为中西教育—文化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准备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晚清留学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形成了颠覆传统“天下”观念、骤然兴起的“世界”观念。这一时期，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众多，所到国家，西洋东洋皆有。留美、留英、留德、留法与留日学生数目庞大。尽管留学生的质量参差不齐，但他们对现代的了解，却进入具体而深入之境。“世界”就此真实地展现在留学生眼中。诚如杨度在留日时期展示给国人的现代思想世界，是如此丰富和目不暇接，是如此期待变革和谋求发展。

“欧洲自十八世纪以来，思想横溢，沛然如骤雨之下，或主唯神论，或主唯理论，或主唯心说，或主唯物说，或主天赋人权说，或主世界主义，或主个人主义，或主实利主义，或主感觉主义，各挟其专精独到之理论，以争雄于学界，因而弥及于社会，形之于实事，使之有日进千里之势，以成今日之文化。然则自中世纪末以至今日之欧洲，何日而非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亚丹斯密、达尔文、斯边撒诸贤之精神，相递相裨夺以成此过渡时代之现象，至今而未有已也乎？日本汉学一变为欧化主义，再变为国粹保存主义，其方针未变，其进步未已也。……然则维新三十年来之日本，又何日而不视欧美之进步以为进步，奋起直追，惟恐不及，以成此过渡时代之现

〔1〕 陈学恂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象，而不知其所止也乎？由此观之，则我中国者，以东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将来，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夫岂难耶？同人之译是编也，将以为扶植老大、培幼稚之助也。”〔1〕

第三阶段则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大规模留学运动促成中国与世界的相关性认识。比较文化视野的出现，对于中国认识自己发展的阶段、国家重建的任务等重大事项，具有极为重要的塑造作用。

“中国数千年与外隔绝，以为九州即天下，环绕皆四夷，故开化虽早，而因乏竞争，文化不进，间或退焉，近世纪交通日便，国际关系日密，始见欧美诸国开化虽缓，而三四百年内文化骤进，今远超乎于我。于是我国有志之七，愤文化之停止，欲得国之学以为补救之策，由是留学兴焉。留学者留其地以师人之能，师人之能难期胜人，而先求与人同等，则留学实最便之途，故留学者过渡之利器耳，欲别出新裁有以胜人，则非既得其学更自研究不可。”〔2〕

此后，因为政权转移和局势不稳等缘故，留学运动时断时续，但总的说来延续了这一时期形成的留学理念，并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

其次，留学运动促进中国人形成了现代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主要由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两个部分组成。其核心观念，就是五四时期凸显的“科学”与“民主”。留学运动对于将现代知识体系和政治体系引入中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留学运动将中国引向现代转变最为关键的动力所在。就“科学”一端来

〔1〕 杨度：《留学译编》叙，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2〕 侯德榜语，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看，将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融合在一起的广义“科学”之谓，是中国留学运动悉心所向的主要支点。所谓用简捷的方法造就治国安邦的人才，主要落脚点就在两个：一是及时有效地培养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二是全面引进留学国家的政经法制俾使中国迅速腾飞的人士。就前者言，五四前留学欧美国家，专心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留学生甚少，绝大多数都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学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1〕}这是因为，留学生认识到，“中国今日为建设时代，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非性情天才不太近于实用之学者，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美国全体留学生中，多习实用之学，铁路、矿务、农、工商、政法等科，诚为当今之急务。而习此者十之八九。”就后者言，留学日本者多数对治国之道甚感兴趣。作为长期学习模仿中国的国家，在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之后，日本被中国人认定，其国家变革之道乃是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答案所在。因为“泰西各学，自政治、律例、理财、交涉、武备、农工、商务、矿务，莫不有学。日本变法之始，遣聪明学生出洋学习，于泰西诸学灿然美备，中华欲游学而成，必自日本始。”^{〔2〕}这是一种急切地寻找为国家解困之法的留学运动必然的进路。到了民国尤其是五四之后，由于留学生明显增多，各个学科均分布有留学生，全方位引进现代科学与民主，即现代知识体系与教育方式、现代国家建构进路与理论方法，才真正将中国留学运动与国家建构全面而直接地联系起来。无疑，今天的人们可以从科学与民主的定位缺失上，来批评留学运动引进现代西方文化的严重缺陷。但是，对于一个明显处于僵化状态的古老帝国而言，打破僵化局面，引入活性因素，是促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的前提条件。而且，中国现代认知世界方式，以及建构现代国家的

〔1〕《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2〕《劝学篇》，杨深秀语，转引自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道路之呈现，确实与留学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最后，就是推动中国社会走出传统局面，走进现代境地的巨大转变。一方面，留学（游历、游学）运动让人看到中国“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的国家处境。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对于国家全方位变革的论述，就是基于他们游历、游学与留学的直接经历。而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的领袖们，也大多在留学欧美的时候，形成了他们革命建国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留学运动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建构现代国家的共识。无论康梁与孙中山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进路上差异如何巨大，即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将中国导入多么不同的国家发展轨道，但他们三人主张建构现代中国的总体看法却是一致的。康梁之拒绝革命，是因为他们认定改良足以兴中国议会民主政治；^{〔2〕}孙中山之呼吁革命，是因为他认定中国非经一场革命，不足以建立宪政政体。^{〔3〕}而三者论及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最后目标的共同指向，无疑都是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即使是1949年政权转移之后，曲折前行到1980年代，国家仍然在留学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手中，转换到了现代发展的正轨上来。再一方面，留学运动提供了中国进行社会政治变革的各种方案。可以说，现代西方建构国家的各种方案，均经留学生之手传入中国。不过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当人们能够拒斥成王败寇的简单逻辑，从真正推动国家现代转变的视角观察问题，那么，从严复到胡适这些留学生对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进路的描述与分析，堪称中国人关于现代政治的正见。因为只有他们才准确理解了现代西方的

〔1〕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2〕 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二十一章“真理和谬误：康有为的追求”，第408页及以下以及第二十二章“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第437页及以下。

〔3〕 论者指出，孙中山不愿意充当革命者通常需要做的残酷无情的角色。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只是因为革命乃是建构现代中国不得不诉诸的手段。但“他从不动摇地为中国的统一和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俾使这个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他也从未放弃这种希望：建立一个基于社会正义的民主社会，而这种社会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页。

发展所由、现代结构的关键所在、国家发展的命脉所系。而其他各种流派的思想，要么落于精致理论的思维窠臼，要么流于颠覆秩序的空幻呼号，从而成为误导中国走向国家建构歧路的观念因素和行动方案。

中国近代以来留学运动对中国现代转变发挥的积极作用，一直是人们论述留学史的主要关注点。这些积极作用，构成了中国留学运动引人关注的、积极的面相。这一面相，当然是这一运动据以展开的动力所在，也是这一运动获得高度肯定的理由所在。但是，除开这一积极面相，中国留学运动还存在着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消极面相。那就是前述这一运动中存在的、对现代的误解，从而对中国现代转变发生误导作用的面相。这一面相的构成，是极为微妙和复杂的。微妙就微妙在，构成中国留学运动消极面相的人与事，都是积极投身留学欧美、日本、俄国的人士掀动的，旨在推动中国现代转变的思想、人物与事件。他们在主观自觉方面，不仅没有抵抗中国现代转变的态度，而且还积极设想并努力推动国家的现代转变。因此，即使它们发挥的作用是消极的，但态度却是值得肯定的。而这一面相复杂就复杂在，其投射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创新、社会科学与社会变革不同界面上，体现为完全不同的作用。如果说留学运动广泛、直接、深入且长期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兴起、发展和成熟的话，某些科技领域的人与事一时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那也是不值得惊怪的事情。如果从社会科学领域来看问题，事情似乎就紧要得多。无疑，现代社会科学被引入中国，是出国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值得大书特书的功劳。但由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误解，尤其是对于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方式的误解，所引发的误导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消极作用，就是需要慎重加以描述、分析和解决的问题了。

从本书关注的主题来看，一批批留学欧美、日本、俄国学习现代政治学的留学生，在积极面相上，为中国确立现代政治理念、认同现代国家建构制度、改良日常生活方式，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消极面相上，一些留学生对现代政治在知识上和政治实际操作上的严

重误解，不仅成为中国人形成现代政治学知识的障碍，而且对于中国确立自己国家政治发展的现代进路，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这样的影响，既与研习政治学的留学生自身政治理念的先见有关，也与他们误读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与政治生活事件相联系，更与他们急于为国家开出政治转轨的药方息息相关。为此，从现代政治学知识与实践的两个界面，对之加以解剖，就有其必要。由于留学运动的积极面相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极其需要对其消极面相加以描述和分析，以便提供一幅完整的，由留学运动构成的中国现代政治画面。而这正构成本书的论述主题。本书试图在观察留学运动高峰期，即上个世纪初期的三十年，以及晚近三十年关乎国家建构的留学生论述的基础上，对留学运动中出现的建国主张，进行清理。这不是对留学运动的全面叙事，而是针对某一主题进行的专门论述，尤其是针对留学运动关于建国的误解进行批评性讨论。论述的留学生，也不是整个留学生群体，而是那些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产生过不可忽视影响的、跨学术与政治两个领域活动的留学精英。所论不求全面，但求典型，俾使留学精英关乎现代政治的误解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回归现代建国的正道。

二、学术与政治的纠缠：现代政治的正见与误解

首先需要肯定前往欧美、日本、俄国留学的研习政治学^{〔1〕}的留学生，无疑对中国形成现代主流的政治理念、制度认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本书所指留学运动的积极面相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政治的正见，就从这些作用上体现出来。从总体上来看，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大多对中国的现代转轨有一个急切的认识。因此他们悉心研习现代政治理论，确立起自己关于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观念，

〔1〕 正像本书所使用的留学生这一概念，包括游历和游学欧美、日本、俄国的人士一样，此处所谓学习政治学的留学生，也是一个将其内涵扩展了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包括那些直接研习政治学，而且包括那些返回中国后表述过发生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留学生。

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进路和具体方案。这是中国留学生形成的足以推动国家顺畅实现现代转轨的政治正见。从典型个案上看，留学英国的严复与留学美国的胡适，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论把握和实践理解，是最为准确和可靠的。严复是中国留学运动早期阶段的著名代表。严译名著，代表了最早阶段留学生接触西方社会科学文献而能够准确甄别、理解和把握的领悟能力。严复翻译了现代政治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现代经济学的原创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现代社会学的重要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现代法理学的经典著作——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等等。基于自己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严复准确地指出，“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1〕进而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了精确的描述。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取决于中西自由观念的绝然不同，“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2〕为此，严复明确总结西方现代政治乃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这样的认识，即使放到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看，也诚属可贵。〔4〕

而后来留学美国的胡适，乃是中国现代建国过程中，堪称准确把握现代政治真精神的第一人。这一方面体现为他对于现代政治基本价值理念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他在现代中国建国过程

〔1〕 严复：《论世变之亟》。

〔2〕 严复：《论世变之亟》。

〔3〕 严复：《原强》。

〔4〕 但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由于严复过度受到寻求国家富强目标的制约，因此自由、民主、平等与人民诸如此类的理念，实际上是作为富强的手段而被定位的。参见〔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严复这种似乎矛盾的认知，是在切近中国建国现实时才呈现出来的。但他对西方语境中相关政治理念的认知，确实是相当准确的。

中对各种妨碍中国实现现代转变的主张的坚决拒斥上面；再一方面则体现为他在起伏不定的中国现代建国过程中身处权势漩涡，但却坚定不移地主张民主政治的政治实践上面。就第一方面而言，胡适对于现代政治基本理念的理解，是相当准确、系统和深入的。这是一种对现代政治具有极高判断力的表现。他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判断力，是因为他对于现代政治绝对不只是像他的留学同辈一样，常常只是流于泛泛地欣赏，因此很容易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政治思潮中顾盼左右、无以确信。胡适是有极为坚定的现代政治信仰的人。这与他对于现代政治信念极为准确的认取，具有密切关系。他指出：

“自由主义的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笨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世间的民族，在这个大运动里，努力有早有晚，成功有多有少。在这个大运动里，凡是爱自由的，凡是承认自由是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的，凡是承认自由难得而易失故必须随时随地勤谨护视培养的，都是自由主义者。”〔1〕

基于他这种关于现代历史的总体认识，胡适对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自由，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释。其中，他格外强调了自由的精神特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制裁之下解放出来。中国禅宗和尚爱说‘治病解缚’，自由在历史上意义是‘解缚’。解除了束缚，方才可以自由自在。”〔2〕这样的理解

〔1〕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载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2〕 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载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